

《事文类聚》的成书与版本

沈 乃 文

《事文类聚》是一部宋元时代的类书。南宋的祝穆编成了这部书的前集六十卷,后集五十卷,续集二十八卷和别集三十二卷;元代的富大用续编了新集三十六卷和外集十五卷;祝渊续编了遗集十五卷;七集共计二百三十六卷。

祝穆当年拟将天下的事物和词章,比类相从,汇为一编,如前集先按天道、天时、帝系、人道等分为十三部。然后在每部之下再分为若干目,如天道部按太极、天、日、月、星等分为十八目;每目之中,事居于前,文列于后,如太极目下,先列群书要语和古今事实,再列古今文集;文集中,先列杂著,再列古诗。从《事文类聚》的书名上,可以一望而知,这种体例沿袭自唐代的类书《艺文类聚》。在祝穆所分的门类中,没有地理。这是因为他先编有另外一部按州郡区划辑录事文的类书《方輿胜览》,通常被视为地理总志。从取索的角度来说,两部书可以配套使用。祝穆门类中还缺略的职官方面的内容,则为富大用和祝渊续编的三集所补充。祝穆“自序”云:“讲学固以穷理为尚,而考古订今,亦必资记问之博”,是书不仅有助于“赋诗以吟咏情性,或立言以发明理致,讲学之士亦将有取,岂徒类书之云乎”。就是说,编书的主要目的,是供作四六文和登临题咏者征引典故辞藻,同时讲学论理需要事文例证者也可以参考。

祝穆是深受朱熹影响的读书人,初名丙,字和父(惟《事文类

聚》自序落款“晚进祝穆伯和父谨识”,似又字伯和)。曾祖祝確在世时,家居徽州歙县,称新安祝氏,家产几达郡城之半。由于祝穆的姑奶奶是朱熹的母亲,父亲祝康国在家境败落之后,遂于乾道年间举家投朱熹,迁至建宁崇安。祝穆幼年和弟弟祝癸在建阳庐山之颠云谷的晦庵,随朱熹读书。祝穆一生未仕,以所编《方輿胜览》和《事文类聚》两书,传名后世。他的家世主要见于两书中都收录的朱熹撰“记外大父祝公遗事”和吕午撰“跋祝公遗事后”。他的生平则主要见于吕午所撰“《方輿胜览》序”,明清各类书中的祝穆小传,均从此文中变出。祝穆临终时,犹盼宋军克复疆土,称得上是一位爱国者。吕午对他的评价,“性温,行淳,学富,文赡”,从其所撰“南溪樟隐记”的文字和《方輿胜览》、《事文类聚》引书的广博来看,大致合乎实际。

祝穆生卒的准确时间不见记载。朱熹“记外大父祝公遗事”撰于庆元四年腊月(1199),称其“已总发,能诵书矣”;穆子祝洙跋“南溪樟隐记”于宝祐六年(1258),谓父亲已经过世。则祝穆当生于宋孝宗淳熙末年,卒于宋理宗宝祐初年,年逾60岁。

关于祝穆的乡贯,谭其骧先生在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的《宋本方輿胜览》撰写的“前言”中指出:祝穆是“建宁府崇安县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祝穆是建阳人是错的”。“本书卷首吕午序在‘祝穆和父’上系以‘建阳’二字,这是建宁府的郡名,不是县名”。又指出:“祝穆自序署乡贯作‘建安’,各卷卷端署‘建安祝穆和父编’,‘建安’也是郡名。”略可商榷的是,祝家虽然先依朱熹迁至崇安,祝康国卒于崇安,祝穆生于崇安,因而《徽州府志》等书称他们为崇安人。但是朱熹、祝穆后来均迁居建阳。朱熹最后卒于三桂里的考亭。祝穆“南溪樟隐记”自述“卜居南溪”。南溪在永忠里的麻沙镇之南,即往庐山云谷之径的入口处,其地多奇石悬瀑,又有巨樟,祝穆遂自号“樟隐”,后歿于彼。所以明清《建宁府志》、《建阳县志》、《福建通志》等书均称朱熹、祝穆为建阳人。据此,吕午所云,

或非郡名。“总目”所云,亦未必失当。另外,南宋时期建阳人自称为建安人十分普遍,如今天所能见到的建阳书坊刊记,绝大多数自署里贯为建安。祝穆在“《方輿胜览》跋”的落款、《方輿胜览》和《事文类聚》的卷端,以及在他所订正的《全芳备祖》的卷端,均自署建安祝穆,可能即此习俗。然而《[嘉靖]建宁府志》卷十五“选举”,将绍兴十八年(1148)王佐榜的朱熹列在建阳县,而将宝祐四年文天祥榜的祝洙列在建安县,则祝氏父子当时的板籍或许就在建安,这种可能性也不能绝对排除。

富大用生平不详,仅从新集、外集卷端所题的“南江富大用时可编”几个字中,得知他字时可,是南江人。由于新、外两集记有“大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职官,最早的刻本在元泰定以前,因而可以认定他是元代前期人。迄今见存的新、外两集元刻本,均与前四集同刊,无单刻者。若史实如此,富氏身世或与书业有关。《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事文类聚》条批评:“穆书成于淳祐间,而书中有称理宗庙号者,殆大用等有所追改,非尽原文。是则窜乱古书,开明人一代之恶习,为可憎耳。”然而作增改者乃祝洙,他将“南溪樟隐记”补入《事文类聚》续集,即为一证。祝洙是宝祐四年(1256)进士,曾任兴化军涵江书院山长,授太学博士,其父各著作的编刊,他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谈不上是窜乱古书。“总目”所云,既张冠李戴,又借题发挥。

祝渊生平亦不详,仅从遗集卷端所题“建安祝渊宗礼编”中,知道他字宗礼,是建安人,不知是否祝穆的族裔。遗集既然是拾新、外两集之遗,他的时代自然晚于大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谓遗集所载制度因革至元初止,所据底本又为元代麻沙版,遂信祝渊为元人。引人注意的是,今存《事文类聚》的元刻本中,没有遗集。见诸著录的元版遗集中,“总目”记录的江西巡抚采进本,是否元代麻沙版?《持静斋书目》续增子部记录的元刊本,是否元刊?语焉不详,均可质疑。《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七记录的泰定三年(1326)

庐陵武溪书院刻本,今存北京国家图书馆,并无遗集;海内外今存同版十余部,皆无遗集;因知所记遗集不实。《涵芬楼烬余书录》记录的元刊本,遗集“已佚”,奚知其有?当是假设。《雁影斋读书记》记录的十四行二十八字元刊本,并非元刊。因此,祝渊是否元人?还有进一步取证的必要。

历代对《事文类聚》的评价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认为优点是编排“条列件系,颇为赅备”。其他类书“所收古人著作,大抵删摘不完,独是书所载,必举全文。故前贤遗佚之篇,间有藉以足征者”,“在宋代类书中,固犹为可资检阅者矣”。六朝文字的骈俪之风,经唐至宋,弱而未衰。祝穆从小习作四六,抄录汇编资料以备临文之需,积累一生,为作四六文“量身定制”了参考书《方輿胜览》和《事文类聚》。在先编《方輿胜览》的时候,他曾依循前代类书的编制方法,对名家诗文断章摘句,受到朋友的批评,方愧其破碎断续,首末不贯,遂益取矩篇短章,悉载全文。而后,复以此例行于《事文类聚》。随着骈文于元明以后逐步衰落,两书为写作四六文提供典故辞藻的作用渐趋淡化,而全文收录的前贤作品,却为后代保留下来若干单行失传或残缺的宋及宋以前的诗文,使两书具有了出于祝穆本意之外的另一种价值——保存文献的价值。“总目”行文的着眼点,就反映了时代的发展。“总目”指出的是书缺点,是自他书中转录的引文,未尝再去核对原书,致有讹误之误。“盖辗转贩鬻,迷其本始,殊不及前人之精审”。表扬与批评,至今看来,皆中正鹄。

《事文类聚》今存的最早刻本是元刻本,但是前四集有没有过宋刻本呢?元刻本的版式是自行起例?还是翻刻了宋刻本的样式?因无宋刻本存世,疑问迄无答案。《述古堂书目》的类书类记载有宋版“《事文类聚》二百二十卷十本”,其中包括了元代续编的新集和外集,显然不是宋版。《天禄琳琅书目》卷九《新编古今事文类聚》条认为:“《宋史》‘艺文志’不载此书,似是穆虽撰成,自为作序,而其书仍未刊行,是以《宋史》不为著录。”认为《事文类聚》没有宋刻本,

这当然是可能的。然而也有一些蛛丝马迹,表明《事文类聚》或许有宋刻本,兹举四端:

一、祝穆家庭和居住在建阳的朱熹等前后几代学问家家庭一样,在建阳这个当年规模最大的书籍生产集散地,都曾从事刻书和卖书,以获利作为家庭经济来源的一部分。祝家已经刻过《方輿胜览》,《事文类聚》的前四集成于理宗淳祐六年腊月(1247),当时祝穆约50岁,虽然自叹“今老矣”,但是文稿杀青之后,岂能没有印售的考虑?付之梨枣是可能的。

二、淳祐九年(1249)黎安朝在袁州太守任上刊行了赵希弁所撰的《郡斋读书志附志》,其中载有《事文类聚》前集六十卷。赵希弁是宋宗室,历史学者,字君锡,袁州人。他奉黎安朝之命编“附志”,用的是自家三世的藏书。“附志”此条推翻了前述《天禄琳琅书目》意见的依据。然而为什么只有前集呢?清末杨守敬在日本东京翻阅宋嘉熙刻本《方輿胜览》后,判断祝穆之所以在书的内容前后一贯的情况下,将书断为三集,是因为刻资不足,只好分段付梓(《日本访书记》卷六)。从嘉熙本《方輿胜览》前集卷四三末所镌的“淮蜀见作后集刊行”木记,证明前、后集非同时刻成。到咸淳本《方輿胜览》因全书一次刻完,遂不复分集,统排为七十卷来看,杨氏言之有据。以此推论,祝穆将《事文类聚》分为四集,除了分批付之剞劂以外,也没有更好的解释。再联系“附志”成书于《事文类聚》前四集成书的三年之后,所记录的前集六十卷,如果是抄本,不应只抄前集即止,因而有可能是祝家刻印的《事文类聚》的第一部分。如果后集也曾刊行,则当在祝洙补“南溪樟隐记”入后集的宝祐六年之后。也就是说,祝穆生前可能刻了前集,而祝洙可能刻了后、续、别集。顺便说,“附志”记载前集有吕午序言,而祝穆自序云:“伏惟当世大贤,衿其用志之勤,赐之序引,使附以有传,而不终泯于覆瓿,又幸矣。”未提吕序,今天见存的元刻本亦无吕序。吕序原委如何?有待新证。

三、《方輿胜览》今有两种宋刻本存世。一种刻于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书分前、后、续集和拾遗,半叶小字十四行二十五字,有嘉熙三年吕午序和祝穆跋。今存孤本藏日本宫内厅,2001年线装书局线装影印出版。吕午序云:祝穆“近访予钱塘马城之竹坡,曰:‘编成矣,敢名以《方輿胜览》,而侵梓以广其传,庶人人得胜览也。’”书前所冠嘉熙二年(1238)“两浙转运司录白”云:“据祝太傅幹人吴吉状:‘本宅见雕诸郡志,名曰《方輿胜览》,并《四六宝苑》两书,并系本宅进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板,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祝穆当时40岁左右,这是《事文类聚》成书之前,祝家刻书和申请打击“盗版”的状况。

另外一种刻于度宗咸淳三年(1267),晚于初版28年。是时祝穆已逝,祝洙取消分集,统编全书为七十卷,半叶小字十四行二十三字,有吕午序、祝穆跋和咸淳三年祝洙跋。传本今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者,为艺芸书舍、海源阁旧藏,印行较早。存于上海图书馆者,印行较晚,补版中改动文句,和改繁体字为简写字之处颇多,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存于北京大学者有两部:一部为燕京大学旧藏,误作嘉熙三年建安祝氏刻本;一部为李盛铎木犀轩旧藏,作宋刻元印本;两部均与上图藏本同版。祝洙跋文云:《方輿胜览》“行于世者三十余年,学士大夫家有其书,每恨板老而字漫耳。益部二星聚临闽分,文昌实堂先生吴公漕兼府事,乃遣工新之。中书朔斋先生刘公府兼漕事,又委官董之。厥书克成,两先生赐也。”吴实堂即吴坚,字彦恺,天台人,淳祐四年(1244)进士,于咸淳初年任建宁知府,同期还刻有《朱子语类别录》、《张子语录》、《龟山先生语录》等书,德祐二年(1276)官至左丞相后,降元。刘朔斋即刘震孙,字长卿,东平人,刘摯六世孙,魏了翁女婿,继吴坚之后任建宁知府,后任礼部侍郎,咸淳四年卒。根据跋文,书为吴、刘所刻,而吴、刘均为朝廷命官,书却仍然由祝家具状报官,可见祝家是书版

所有人。书前所冠的咸淳二年(1266)“福建转运使司录白”云:“据祝太傅宅幹人吴吉状称:‘本宅先隐士私编《事文类聚》、《方輿胜览》、《四六妙语》,本官思院续编《朱子四书附录》进呈御览,并行于世,家有其书,乃是一生灯窗辛勤所就,非其他剽窃编类者比。当来累经两浙转运使司、浙东提举司给榜,禁戢翻刊。……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给榜下麻沙书坊、长平熊屯刊书籍等处张挂晓示。仍乞帖下嘉禾县,严责知委。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追人毁板,断治施行,庶杜翻刊之患。’”长平在麻沙西北的禾平里南部,是熊氏刻书家族的聚居地。嘉禾县就是建阳县,县名改于景定元年(1260)。《事文类聚》的成书与前集的可能梓行,至咸淳二年均已将近20年。此时《事文类聚》既然与《方輿胜览》等书并行于世,多至家有其书,需要与再雕新版以满足市场需求的《方輿胜览》共同禁戢翻刊,以保护祝家的利益,则书已印行是可能的。

四、日本宫内厅今藏南宋宝祐年间建阳刻本《全芳备祖》,虽已残缺,却是海内孤本。1982年农业出版社、2001年线装书局先后影印出版。书分前、后集,半叶小字十三行二十四字,卷端题“江淮肥遁愚一子陈景沂编辑,建安祝穆订正”。从书的体例编排,版式写刻来看,均具祝家编刊风格,与前述《方輿胜览》相近或一致,显然雕印过程有祝家参预。以今存的元泰定庐陵武溪书院刻《事文类聚》,与宋刻《方輿胜览》和《全芳备祖》并看,编排、版式、行格皆相近或一致。武溪书院刻本系翻刻另一元刻本,则另一元刻本的翻刻底本,有可能是与《方輿胜览》、《全芳备祖》编排版式雷同的祝氏宋刻本。再有,武溪书院刻本的各卷题名作“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卷之几”,下空数格后,以墨围白字标“某集”。不用说,如果所标的“某集”失去,各集的相同卷次就会彼此混淆。但是在前集六十卷中,国图藏本间断地标有“某集”者仅十一卷,显然是后来添加的。也就是说,刻前集的时候,还没有后集,所以忽略了以后会出现的问题,待到后集付梓,方予弥补。然而武溪书院刻本是一次刻成的,不当如

此。惟一的解释,是照样翻刻了分批刊成的底本。还可一并说道的是,元刻《事文类聚》中,“桓”字或讳或不讳,也有可能是翻刻宋刻本的痕迹。

祝家于咸淳二年告官,请禁翻版《事文类聚》、《方輿胜览》的仅仅九年之后,德祐二年元军攻破临安,南宋沦亡,兵荒马乱,社会动荡。《事文类聚》如果有宋刻本,当毁于此时,元刻本遂取而代之。今天见存的《事文类聚》元刻本,只有两种:

第一种是元代前期建宁府建阳县云庄书院刻本,分前、后、续、别、新、外六集,半叶十三行二十四字,镌“建安云庄书院刘氏刊行”的刊记,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事文类聚》最早刻本。因为泰定三年时吉州军庐陵的武夷书院曾经翻刻是版,所以是版的雕造时间当在泰定三年之前,是元代前期的刻本。

云庄书院在崇泰里的太平山麓,即朱熹住过的庐峰云谷之地,云庄亦从云谷得名,可以算是祝穆家的乡亲。书院原为刘燠故居,刘燠是朱熹的学生,曾任国子监祭酒,并曾在太学刻过朱熹的《四书集注》。刘燠卒后,故居先改为祠堂。宋理宗于嘉熙三年表章刘燠,赐“云庄书院”额,祠堂遂改建为书院,教授乡人子弟。景定五年(1264)书院设山长,至元泰定四年(1327),山长为刘燠六世孙刘垵。从传本的刊记上看,当时是刘燠后人主持书院,兼办书坊。年久事湮,有关书院、书坊、刻书的更多情事,今已难知其详。明永乐十四年(1416)云庄书院毁于洪水。

使人深感遗憾的是,完整的元代前期云庄书院的初刻本,今天已经见不到了。能够见到的只有后世用残存的云庄书院初刻版片,和元末明初之间补刻的版片配套刷印的本子,没有全本,只幸存有个别残本。今知有两部。一部仅有后集,藏浙江图书馆。初刻版片模糊残损严重,有大量补版,卷四七末有刊记“建安云庄书院刘氏刊行”。另外一部也是仅有后集,抗战前藏北京图书馆,今寄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版片情况大致与浙江图书馆藏本相同,也有刊记,未

知两部是否互为复本。

残本的初刻版片漫漶模泐已甚，但是惟此可见初刻本的零星面貌，属于珍贵罕见的传世实物。鉴别初刻版与补版，除了版片的新旧、刻版的早晚可以目检以外；初刻版的特点之一，是有若干简写字；而补刻版则将初刻版的简写字全改为繁体，使人感觉补版时间似在明初。要了解云庄书院刻本的整体面貌，今天只有借助武夷书院的翻刻本，才能间接地知晓一二。

还有两点希望，一是《经籍访古志》著录，奈须氏久昌院藏有一部纸刻精良的元槧之佳者，六集齐全，半叶十三行二十四字，卷首木格内记“云庄书堂”。未知是否即是此版？渴盼有缘一见，俾便验知结果。再是武夷书院翻刻是版时，用的是影刻法，两版几近全同。所以难免有个别云庄书院刻本，至今仍被错误地当作武夷书院刻本。希望真的有误混于武夷书院刻本之中的云庄书院刻本被发现，可以更多地了解云庄书院刻本的面貌。

第二种是泰定三年吉州军庐陵武夷书院刻本。如上述，是版差不多可以称为建阳云庄书院刻本的影刻本，自然也分前、后、续、别、新、外六集，半叶十三行二十四字，新集、外集目录末镌“泰定丙寅庐陵武夷书院新刊”的刊记。是版几乎能乱云庄书院刻本之真，但是翻刻中将云庄书院刻本的若干繁体字改为简写字，如“遷”作“迁”，“蟲”作“虫”，“變”作“变”，以及“悒悒”作“悒二”等类，具有宋元时代翻刻书的典型特点。

武夷在太和县西20里，发源于武山，历牛吼江入赣水，则武夷书院当在庐陵县之南。书院当年无甚影响，而今文献难征。

今藏是版者，大陆有近十家，台北中央图书馆、日本公文书馆、静嘉堂文库、大东急纪念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米泽市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均有收藏。各部之间，全残不一。

中国国家图书馆今存涵芬楼旧藏本，书品差不多是各家所藏的同版书中最好的。但是新集目录末叶的后半被裁弃，外集目录末

叶后半的中间被剝去,补以栏线,毁掉了泰定武溪书院的两处刊记,以至199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时,仅注为“元刻本”。《涵芬楼烬余书录》云:“外集卷目末叶后幅有剝补痕,作长方式,疑即木印所在,被市估毁弃,将以伪充宋槧也。”说的正确,遭到书估同样手脚的是版传本,还有其他。国图今存铁琴铜剑楼旧藏本,书品较差,行书字的祝穆序与楷书字的别本不同,是后刻的。国图原来还存是版两部,一部有武溪书院刊记,是晋府旧藏;另外一部与云庄书院补刻的后集配套。两部于抗战时运往后方,今天均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北京大学今存两部,一部为□8418,前集、后集、新集残,别集、外集全,无续集。另一部为□031·85/3626,仅有续集,亦残。两部均刷印于明后期,原版片模泐严重,后世多次补刻的版片占了一大半。但是前者的新集、外集目录末,均有泰定武溪书院刊记。前、后、别集中,若干卷端题“后学古曹李明重刊”。李明为补刻重印者之一,写刻欠佳,不类“专业”书坊所为。台北中央图书馆今存曹寅棟亭旧藏本,亦经李明补刊,或与北大藏本互为复本。

在前人的著录中,《平津馆鉴藏书籍记》记载是版较早,因版匡高17公分,遂称为巾箱版,颇易使今人误会。《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七记载是版的遗集问题,已于前叙。《艺风藏书记》卷五记载是版有刊记,但云“每半叶十四行每行二十六字”,与是版不符。缪荃孙当年颇重行格,所记却时常有错。此处的刊记与行格,未知谁误?所记之书铃怡府、明善堂、安乐堂印,当可寻知其真。

《事文类聚》在明代的刻本甚多,其中刻印最讲究的,是十行十八字的内府刻本,无遗集,宽版大字,写刻精良,国图、北大、台北故宫博物院等都有收藏。

明刻本中影响最大的,是十四行二十八字本,亦无遗集,今知有五种之多。包括书林明实堂刻本(别集卷二四后刊“书林明实堂重新刊行”,国图、南京图书馆等藏)、正德刻本(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嘉靖建阳知县南海邹可张订刻本(卷端题“知建阳县事南海邹可张订刻”。邹可张,举人,嘉靖三八年任建阳知县。台北中央图书馆藏)、嘉靖四十年(1561)书林杨归仁刻本(外集后刊“嘉靖辛酉岁仲夏书林杨归仁重梓”。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十数家藏)、万历三十五年(1607)书林刘双松安正堂刻本(浙江图书馆、清华大学、日本公文书馆等藏)。

上述的书林明实堂刻本,写刻依据泰定庐陵武溪书院刻本,但是将版式改为半叶十四行二十八字,古往今来,被不少专门家、藏书家误判为元刻本。如《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卷二、《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均误定是版为元刊本。后者更因外集已失,误断与《廉石居藏书记》所著录的泰定庐陵武溪书院刻本同版,并照抄孙星衍之说,将版匡高达19.5公分的是版,也称为“巾箱黑口版”,未免荒唐。1928年《盍山书影》第二辑收入是书书影,解说亦同其误。《雁影斋读书记》记录的十四行二十八字本,虽然不敢肯定就是明实堂刻本。但其以为与四库底本同系元代麻沙本,显然失误。是目还记录有遗集,念及罗振常先生当年曾经添改此目李希圣原稿上的卷数和著者,未知是否振常先生误添?姑俟后考。北京大学今藏三部,一部为□031·859/3047,仅有新集,不全;另外两部为燕大旧藏,一为NC9297/3122·02,前、后、续、别、外集全,无新集;二为NC9297/0248,仅有别集,不全;三部均作元刻本,皆误。

明刻本中传本最多的,是十一行二十四字的万历三十二年(1604)金陵书林唐富春德寿堂刻本,有遗集。卷端自署“金陵唐富春子和刊”,或“建业唐富春子和刊”。版心下镌“德寿堂梓”,在祝穆序后的刊记为“时万历甲辰孟春之吉金溪唐富春精校补遗重刻”。传本不仅大陆有首都图书馆等三、四十家收藏,台北有中央图书馆收藏,而且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公文书馆等国外藏家也不少;有些藏家还有多部,如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藏二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藏三部。

《适园藏书志》卷四五还曾著录有弘治十七年(1504)刻本,有区玉的识语。区玉,广东番禺人,举人,弘治十七年任建阳知县。张钧衡藏书后归中央图书馆,然中央图书馆书目未见著录,是书下落不明。

明朝年间,朝鲜也用活字印行了《事文类聚》。在成宗李娐一朝,相当于明成化五年至弘治六年(1469—1493)间,用甲辰和大庚午字、甲辰和大癸丑字、甲辰字先后印行了数版《事文类聚》,均为十二行十九字,内容包括前、后、续、别、新、外六集,但不再分集,合计为二百二十一卷。在明宗李恒一朝,相当于明嘉靖二十四至四十五年(1545—1566)间,又用甲辰和大癸丑字、甲辰字印行了数版《事文类聚》,仍为十二行十九字,二百二十一卷。《经籍访古志》著录有朝鲜的活字本,但是未判明究竟是哪一版?只记载藏于久昌院,书的副叶上有庆安四年(清顺治八年,1651)蟠桃院智秦的题志和印记。

《事文类聚》在清代,除了元明的刻本仍然流通外,重新刊刻的本子主要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积秀堂翻刻的唐富春德寿堂本。版式无改变,前加封面题:“乾隆癸未重镌,重刊七集,积秀堂藏板”。最主要的抄本则是乾隆年间所抄的文渊等七阁的《钦定四库全书》本。有趣的是,这一时期海外日本、朝鲜翻刻的《事文类聚》,数量颇多。

日本宽文六年(清康熙五年,1666)京都八尾勘兵卫翻刻了经过林恕校对的唐富春德寿堂刻本。延宝六年(清康熙十二年,1673)石桥源兵卫再次翻刻,改书名为《新编古今事类全书》,在前、后、续、别、新、外、遗集之外,又刻印了杂集二卷。《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云:“别藏日本刊本,七集之外,又有杂集二卷,无撰人名氏,疑明人所增。”杂集的内容如何?国内至今几无所知。

朝鲜纯祖李玜三十一年(清道光十年,1830)岭营翻刻了唐富春德寿堂刻本,包括前、后、续、别、新、外、遗七集,仍为十一行二十

四字。《双鉴楼善本书目》卷三记录了这个本子,称为“高丽旧刊本”。

祝穆在《事文类聚》编成的时候,对于这部书是否会“终泯于覆瓿”不无忧虑。今天简略地回顾《事文类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被一再续编,一再翻刻,且远播海外,流传七百余年到今天的过程,可以知道书的内容是切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在古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在保存古代文献,传播中华文化中,都发挥了其自身的作用。今天,《事文类聚》作为传统文化一个侧面的缩影,还在吸引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作不断地研究,它是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的。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

(上接第 69 页)

④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页。

⑤兴吉案:张玉春先生此书虽然出版于20世纪结束之后,而在2000年以前此书的一部分内容已经作为单篇论文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上发表。

⑥《史记学50年——日中“史记”研究の动向》,第137页。

⑦说详《史记版本研究》第334页。

作者工作单位:海南师范学院政法系